

曹植的经典意识与辞赋创作^①

张家国^{1,2},何新文¹

(1.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湖南怀化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作家对经典的接受往往内化为自觉的经典意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曹植正是魏晋之际深受经典影响的代表性辞赋作家,自幼潜心经典,服膺儒学,形成了浓厚的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在其人生观中表现为对儒学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接受;在辞赋创作中,一则表现为主题内容上的积极用世精神;一则表现为语言形式上的对经典话语的建构:或直引经典篇名取其篇章义,或截取经典文句和词语取其字面义,或化用经典词语取其引申义。

关键词:曹植;辞赋;经典意识;儒学理想;用世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1-0157-09

曹植(192-232)生活的汉魏之际,正是所谓“经学中衰”的时期。当此之时,却仍然潜心儒家经典,服膺儒学理想,坚守行仁履义的儒家传统价值道德观念,并在其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作品中含蓄了浓厚的经典意识,从而成为“建安文学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

一 儒学理想:曹植人生观建构的经典意识

曹植的儒学理想表现为对于“圣君贤臣”政治理想的追求。

曹植曾自言其“生乎乱、长乎军”^②。但是,社会的动乱和个人坎坷不平的遭遇,并没有消融他对政治的热情。曹植从源远流长的儒家传统文化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和智慧,建构起充满儒学色彩的“圣君贤臣”政治理想,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追求和奋斗。

儒家文化原本就有赞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历代圣贤的传统。儒家经典著作中,《尚书》有《尧典》《舜典》《大禹谟》《汤誓》《汤诰》《西伯戡黎》《武成》之篇。《论语》中,孔子曰“大

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泰伯》)。《孟子》书中,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公孙丑上》),并专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为“圣者”(《万章下》)。

受儒家经典的影响,曹植不仅在《求通亲亲表》等文章中征引孔子“大哉尧之为君,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类的经典言论,而且通过二十九则历代帝王圣贤《画像赞》的创作,具体勾画了一个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圣君贤臣”模式。

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建安十九年(214),魏宫在邺城建成,23岁的曹植为宫中所绘历代帝王贤圣像作《画像赞》,这是一组对历代圣君贤臣的评说辞。其《画赞序》曰: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忠臣孝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

① 收稿日期:2017-04-22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康达维与《文选》赋研究”(15Y009);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经典与汉赋——儒家经典对汉赋创作的影响研究”(17C1279)

作者简介:张家国(1973-),男,湖南溆浦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②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图画也。^①

曹植作此文时正当盛年,故而词气峻壮,爱憎分明。他秉承儒家道德伦理原则,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其所赞颂的人物均为圣君贤士,如“三皇五帝”“忠臣孝子”,以及气节高尚的“高节妙士”、贞守妇道的“令妃顺后”等,这些人物往往具有“忠”“孝”“节”等品德;而为作者所贬责的人物却往往是那些“暴”“贼”“淫”“妒”的“暴主”“篡臣”,或“淫夫妒妇”。很明显,曹植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所持的正是儒家经典的价值标准。

具体到曹植所作的29篇“画像赞”,可谓是一部历代的圣君贤臣谱。其中圣君多达18人之多,如庖牺、女媧、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汉高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等,构成了“画像赞”的主体,其次为贤臣如周公、许由、巢父、池主、卞随、商山四皓等。例如其《赞》辞云:

《帝尧赞》:克平共工,万国同尘。

巍巍成功,配天则神。^②

《帝舜赞》:颛顼氏族,重瞳神圣。

克协顽嚚,应唐莅政。除凶举俊,以齐七政。膺历受禅,显天之命。^③

《殷汤赞》:殷汤伐夏,诸侯振仰。

放桀鸣条,南面以王。桑林之祷,灾异克偿。伊尹佐治,可谓贤相。^④

曹植对历代圣贤的赞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赞颂历代帝王明君立国保民的“圣明”,如帝尧的“巍巍成功,配天则神”,帝舜的“重瞳神圣”,周文王的“於赫圣德”;二是赞颂忠臣贤相的“佐治”的功德,如“伊尹佐治,可谓贤相”,“旦奭佐治,遂至刑错”,“周公居摄,四海慕利。诵长反政,达天忠义”,充分体现了曹植对于“圣君贤臣”儒家政治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对于汉高祖,曹植虽然充分肯定其“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的盛事帝业,

但却以为其“名不继德,行不纯道,直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乃至“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又说:“《诗》《书》《礼》《乐》,帝尧之所以为治也,而高帝轻之;济济多士,文王之所以获宁也,高帝蔑之不用。”^⑤可见汉高祖是一位缺乏仁孝之德,不习儒家“诗书礼乐”的君王。相反,光武帝刘秀却不同:

其为德也,通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乐施而爱人。……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故曰:光武其近优也。^⑥

光武帝仁智明恕、乐施爱人、知于礼法,有仁义道德之善、君臣和睦之美、周公吐哺之勤,于时朝廷上下形成君圣臣贤的王道美德,君臣之间上下同心、恩义怡洽,这是一位以仁化成天下,以德宾服四夷的明君,所以比汉高祖更要优秀。

在辞赋作品中,曹植的儒学理想则往往表现为圣君以仁义教化天下的仁政模式和君圣臣贤的和睦图景。前者如《娱宾赋》曰:

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观之清凉。……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欣公子之高义兮,得芬芳其若兰。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听仁风以忘忧兮,美酒清而肴甘。^⑦

此赋借夏日游观之乐,描写“仁风”和畅、众贤济济一堂骋文妙说的场面。其中“清风”一语引自《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⑧,吉甫即周宣王时的贤相尹吉甫;“周公弃餐”用周公“一饭三吐哺”的典故,作者借以赞扬

①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68页。

②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③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④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⑤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⑥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4页。

⑦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⑧(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9页。

曹丕能礼贤下士、施行仁政;同时,又以自拟,希望能为朝廷效力。后者如《玄畅赋》,所描绘的更是一幅君圣臣贤的政治图景: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
该仁圣之上义,据神位以统方。补五帝
之漏目,缀三代之维纲。……饶余生之
幸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于稷
卨,降合颖于伊望。……弘道德以为宇,
筑无怨以作藩。播慈惠以为圃,耕柔顺
以为田。^①

此赋作于曹丕初登帝位的黄初初年。赋篇颂扬当朝帝王能“该仁圣之义”,“补五帝之目”,继三代之法;作者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有《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一样的幸运,故而希望能够像稷卨辅佐舜帝、伊尹辅佐商汤、太公望辅佐周武王那样辅佐君上,共建一个充满“道德、慈惠、柔顺”、仁爱而“无怨”的王道社会。在这里,曹植所期冀的儒家政治理想得到了完美的诗意呈现。

曹植的儒学理想还表现为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坚守。

与儒家政治理想相联系的儒家道德理想,尤其表现为对于“忠、孝”观念的遵守。《论语》记载,孔子在回答鲁定公如何处理“君使臣、臣事君”的问题时,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可见,儒家所谓“忠”,是指“君臣遇合”之礼。对此,曹植有很充分的理解。如他在《画赞序》将“忠臣孝子”并提;在后来撰于太和二年(228)的《求自试表》中,又说“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②曹植认为:士人“事父”与“事君”有“尚于荣亲”与“贵于兴国”的不同,“事君”于国是重于“事父”于家,所以“忠臣之志”应该是“忧国”而“忘家”的。本着这样的观念,曹植对于其父曹操与刘汉王朝的关系也从儒家“君臣遇合”之礼的角度,作出了解释。

建安时期,曹操操持着刘汉王朝的实际权力,并先后于十三年、十八年被汉献帝任命为“丞相”和“魏王”,且在行文颁诏时也往往以“孤”自称,但曹操在名义上并未称“帝”称“君”,与汉天子仍然存在着“君、臣”名分。所以,曹植恪守儒家崇尚的“君臣”之礼,坚持称其父为“圣宰”“皇佐”。如其诗《赠丁仪王粲》曰“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其《七启》称“世有圣宰、翼帝霸世”。而考之于同时文人王粲及刘桢却有不同,如王粲《从军诗》云“一由我圣君”^③,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曰“昔我从元后”^④。王、刘二人以“圣君”“元后”称曹操,已不合儒家“君臣”之礼。而曹植“皇佐”“圣宰”之称,异于二子,有如明初文人刘履所评:“可谓不失君臣之义。”^⑤

但当其兄曹丕、其侄曹叡称帝之后,曹植遂以“君臣”相称。在曹植上给曹丕、曹叡二人的“表”中皆自称“臣”,而称曹丕、曹叡为“陛下”。因为对于曹植而言,所有人伦关系都应服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人伦关系中的重中之重。

曹植对儒家道德观念的恪守,还表现为他对于“孝道”的独到理解和坚持。如《灵芝篇》是一首申述孝思的诗。诗中先历举“古时”虞舜、伯瑜、丁兰、董永等孝子的感人事迹,然后直接抒发自己的孝道情思说:

岁月不安居,呜呼我皇考。生我既
已晚,弃我何其早。《蓼莪》谁所与?念
之令人老。退咏“南风”诗,洒泪满
衿抱。^⑥

岁月流逝不居,当年宠爱有加的父亲却早已弃我而去。诗人又一次诵读起《诗经》的《蓼莪》《凯风》之诗,心底里追念着父母“劬劳”养育的深重恩情,不禁浮想联翩,泪满衣衫。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真情实感,故有如清人丁晏所评:“读此诗如见纯孝之性。”^⑦

但是,我们细读全诗,深感曹植《灵芝篇》所要表达的并不只是所谓“纯孝之性”。父亲曹操

①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2页。

②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③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王粲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页。

④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王粲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页。

⑤黄节注:《曹子建诗注 阮步兵咏怀诗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页。

⑥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327页。

⑦黄节注:《曹子建诗注 阮步兵咏怀诗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3页。

卒后,胞兄曹丕称帝,竟强令诸王就国归藩,不得与母亲兄弟相见。曹植兄弟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故此时此刻,曹植既想借古之孝子申述己之孝思,更欲借此隐含对于曹丕强行隔绝母亲兄弟的愤怨,和对于传统“仁孝”之道在当今之朝继承弘扬的幻想。于是,诗末又置一章“乱曰”云:

圣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万国咸
礼让,百姓家肃虔。庠序不失仪,孝弟处
中田。户有曾闵子,比屋皆仁贤。髻髻
无夭齿,黄发尽其年。陛下三万岁,慈母
亦复然。^①

《乱曰》这番“朝夕宣德教、四方咸礼让、百姓皆仁孝”的美景描绘,曲终奏雅,歌颂当朝,虽然是当时燕乐歌舞所必具的程序式内容,但也表达了作者关切母亲卞太后的良苦用心,和希望朝廷重视德教礼仪、人民皆行人伦孝道的儒学理想。

二 用世精神:曹植辞赋主题建构的经典意识

曹植“少而好赋”,年十余岁就开始诵读前代辞赋作品。中年以后,所作辞赋作品“繁多”,仅作者去其芜杂、又“删定别撰”的《前录》一书就辑有赋作“七十八篇”之多。可以说,写作辞赋是曹植终其一生的文学爱好。而受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在作品中表现热切的政治理想和“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②的积极用世精神愿望,也几乎始终贯穿着曹植一生前后两个时期的辞赋创作。

曹植生平的前期,是指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卒、曹丕称帝以前的二十余年。这个时期,曹植以其杰出的天赋才华和仁孝之德而深得父亲的宠爱,志满意得之际,常在诗文辞赋中尽情抒写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建功立业的理想愿望。其中,尤以那篇为魏晋之际辞赋家傅玄(217—278)《七谟序》赞为“奔逸壮丽”的《七启》最有代表性。

建安十五年,渴望早日统一天下的曹操求贤心切,亲自颁布“唯才是举”的《求贤令》^③,号令

四方“贤人君子”乃至“被褐怀玉而钓”之人,挺身而出,佐时用世,“与之共治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植创作《七启》之篇以相呼应,鼓励“隐居”之士“奋节显义”“驱驰当世”,为国效力。

《七启》模拟西汉赋家枚乘《七发》的体例,假设主人“镜机子”与隐者“玄微子”的主客问答而连缀成篇。《七启》首段,作者先写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离俗轻禄,不问世事。见此情景,主张入世用世的镜机子往而游说,指出玄微子隐居不仕的行为是“遁俗遗名、背世灭勋、遗仁义之英、废人事之纪”^④的无益之举;并且承诺将为其“说游观之至娱,演声色之妖靡,论变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丽”,可是,玄微子不为所动。接下去,镜机子依次游说以“肴饌之妙”“容饰之妙”“羽猎之妙”“宫馆之妙”“声色之妙”五事以启发他,玄微子仍然无动于衷。一直到镜机子继续列举战国时田光、荆轲等“游侠之徒”重气轻命和孟尝君、信陵君等“俊公子”的“飞仁扬义、陵轹诸侯”的壮举之后,玄微子才有所触动而称“善”焉。于是,镜机子因势利导,趁势而行,最后提出了第七事,启发“玄微子”入仕用世,为当下的现实政治服务:

镜机子曰:世有圣宰,翼帝霸世。同
量乾坤,等耀日月……是以俊乂来仕,观
国之光,举不遗才,进各异方。赞典礼于
辟雍,讲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华说,综
孔氏之旧章。散乐移风,国富民康……
此宁子商歌之秋,而吕望所以投纶而逝
也。吾子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
乎?于是玄微子攘袂而兴,曰:“伟哉言
乎!……至闻天下穆清,明君莅国。览
盈虚之正义,知顽素之迷惑。今予廓尔,
身轻若飞。愿反初服,从子而归。”^⑤

作者借“镜机子”之口渲染当朝圣宰佐帝霸世、国富民康、文教俱兴、举不遗才的政治局面,正是像宁戚、吕望这样的古代贤士辅佐君主,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的大好时机!所以,一直不为所动的玄微子也最终迷途知返,身轻若飞,愿意在这

①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页。

②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③(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页。

④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⑤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天下穆清、明君莅国”的时代,干一番事业。当然,年轻作者曹植的卓越才华和建功立业的志向抱负,也有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七启》之外,曹植写于建安时期的其他辞赋也大多以不同的方式抒写了他的“济世的宏愿”^①。如作于建安十七年的《登台赋》,在夸饰铜雀台的雄伟壮观之后,又着力颂扬了父亲曹操辅佐汉帝推行仁政的功绩,如赋云:

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
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
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②

作者极尽夸耀颂扬之能事,字里行间洋溢着为曹氏家族“翼佐皇家”功业有成的豪迈情怀。

曹植辞赋的用世精神,在涉及军事题材内容的作品中也有比较集中的展现。如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太子曹芳留守监国,年方20岁的曹植抱疾从征。因征期紧迫无暇告辞,故曹植作《离思赋》表达“忆恋”之情。但是,作者仍然在赋中抒写曹氏父子愿为“皇朝”效命疆场、虽死不疑的决心,所谓“念慈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欲毕力于旌麾,将何心而远之。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③。又建安十九年,曹操东征吴国,留守邺城的曹植又因“想见振旅之盛”而作《东征赋》,并在赋中想象曹军横江而下大破吴军的生动情景:“挥朱旗以东指兮,横大江而莫御。循戈櫓于清流兮,汨云梯而容与。禽元帅于中舟兮,振灵威于东野。”^④作者绘声绘色,描写征吴将士驰骋战场、所向无敌的威猛气概,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的具体感受。还有,大致同时所作的《游观赋》,原本是记游观之事,但作者却拟之为军队的出征,如赋中云:

登北观而启路,涉云际之飞除。从熊罴之武士,荷长戟而先驱。罢若云归,会如雾聚。车不及回,尘不获举。奋袂

成风,挥汗如雨。^⑤

登观启行,云梯凌空,像“熊罴”般勇猛的武士荷长戟而先驱,其集散的速度又迅捷若“云归雾聚”:这里描绘的俨然是一派将使出征的情景。而“熊罴”一词又出自《尚书·康王之诰》“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⑥之句,显然也可见出曹植想像自己能够像“熊罴之士”保卫王室的用心。

以咏物赋咏怀,借歌咏器物禽鸟抒写用世情怀,也是曹植前期辞赋的又一特点。这方面的作品,以写于建安后期的《鹞赋》和《宝刀赋》较为典型。

鹞作为猛禽一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勇武善斗的象征,因此古代的武官如虎贲、羽林等多冠“鹞冠”。故曹植《鹞赋·序》云:

鹞之为禽猛气,其斗终无胜负,期于必死,遂赋之焉!^⑦

正是因为鹞具备这种“其斗期于必死”的勇猛气节,所以作者才感而赋焉:

体贞刚之烈性,亮《乾》德之所辅。
戴毛角之双立,扬玄黄之劲羽。甘沉陨而重辱,有节士之仪矩。……若有翻雄骇逝,孤雌惊翔,则长鸣挑敌,鼓翼专场。逾高越壑,双战只僵。^⑧

赋家以紧密的节奏,和一系列“刚”“烈”“劲”“节”“雄”“惊”之类的形容词语,描绘这种敢于“长鸣挑敌、鼓翼专场、双战只僵”的猛禽形象,赞颂勇武无畏、战不惧死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将自己期于奔赴疆场、建立功业的雄心夙愿暴露无遗。

《宝刀赋》的创作,是曹植因为“家父魏王”命有司锻造“龙、虎、熊、马、雀”五枚宝刀,除家父自杖其二外,子桓、子建、子林兄弟各得其一而赋。于是,赋中既叙写宝刀千锤百炼的铸造过程,赞美宝刀“陆斩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刃不纤削”的无比锋利,更热情歌颂魏王“扬武备以御凶”

①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②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③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④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⑤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⑦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⑧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永天禄而是荷”的雄伟抱负。当然,作者借赋“宝刀”而表达爱刀“好武”、用世建功的心志,也不言自明。

曹植生平的后半期,即魏文帝黄初、魏明帝太和初期的十余年间。由于父亲曹操的离世,其兄曹丕、其侄曹叡父子两代帝王的猜忌迫害,曹植从此过着名为王侯、实乃朝不保夕的忧惧生活,政治生命与日常行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可谓是他至死不渝的用世之心和对于辞赋的创作热情。

此期辞赋对于作者用世精神的抒写,可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通过对于两代帝王的颂扬,表白“求自试之心”;二是借叙事咏物之作,寄托“愿返初服”之意。

曹植在曹丕初登帝位之时,曾有过短暂的梦想。如其《喜霁赋》曰:

禹身誓于阳旰,卒锡圭而告成。汤感旱于殷时,造桑林而敷诚。动玉辍而云披,鸣銮铃而日扬。指北极以为期,吾将倍道而兼行。^①

此赋作于延康元年(220),但残缺较多,仅存八句。头四句借用夏禹、商汤两代开国帝王的传说,表达对新君的颂美和期许;后四句言圣王出行,期于北极,作者愿追随圣王足迹。“北极”即北辰,语出《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曹植化用此语,表白自己愿意追随新君曹丕,为建立“德政”理想而加倍努力,昼夜兼程、有所作为。

可是,曹植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曹丕的猜忌和压力。于是,他借叙事咏物之赋,抒写理想遭遇挫折、抱负难以施展的悲哀,执着地寄托着他佐时用世的夙愿初心。如《白鹤赋》中的那只“白鹤”:

痛美会之中绝兮,遘严灾而逢殃。共太息而祇惧兮,抑吞声而不扬。伤本规之违忤,怅离群而独处。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冀大纲之解结,得奋翅而远游。^②

即便遇灾逢殃、离群独处,生活在这样一种战战兢兢、忧惧吞声的处境之中,这只曾经“含奇气之淑祥”的“皓丽素鸟”,似乎仍然没有忘记奋翅

飞翔的理想,它还在盼望着能摆脱罗网而振翅远游,所谓“冀大纲之解结,得奋翅而远游”!

作为终生喜爱辞赋的文学家,曹植这种始终不渝的用世情怀,也同样表现在他晚期的赋作中。且看其《临观赋》曰:

登高墉兮望四泽,临长流兮送远客。春风畅兮气通灵,草含干兮木交茎。邱陵窟兮松柏青,南国菱兮果载荣。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之愬勤,歌《式微》以诉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③

此赋作于太和年间,已是曹植人生末年的作品,但是仍然突出地表现了对于生命和世事的执著。作者面对春风和畅的广泽原野,草木滋荣,松柏青翠,万物复苏,却无法享受眼前生意盎然的美景,而是从万物适时“逸豫”的自然规律中深刻感受到了自身命运的乖违,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严重相违的矛盾。于是,作者诵读着歌咏“惓惓不归”的古代诗篇,悲从中来,怨从中来:为什么再无路报效朝廷以建功业,为什么再不能像鱼儿一样在水中遨游,再不能像飞鸟一样翱翔在万里蓝天?此时此刻,《临观赋》读者无不能感受到赋作者并未止息的用世精神及其壮志未酬的不屈情怀。

诚如上述,辞赋是曹植终其一生的文学爱好,表现儒学理想和积极用世的主题情感,也几乎贯穿了其创作的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赋篇。

三 语出经典:曹植辞赋话语建构的经典意识

对于儒家经典的接受和运用,不仅成为曹植儒学理想和辞赋创作的重要取义来源,也构成了其辞赋作品重要的话语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

曹植自幼诵读经典,服膺儒学,对于《诗》《书》《礼》《易》《春秋》及《左传》《论》《孟》等儒家经典著作,可谓烂熟于心。故而写诗作赋之时,往往能够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且左右逢源,不露痕迹。例如其著名的《学官颂》,一篇仅仅百余字

①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②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③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页。

的颂文,先引孔子《论语》“有颜回者好学”之语开篇入题,中间化用《尚书》《诗经》《孟子》诸经典的文辞句义,最后以《礼记·曲礼》“请益则起”句意结束。全篇的文意和话语,几乎皆从经典征引和化出。读者如果不熟悉所引经典的本事,就不能读懂文本字面所包含的真实意义。

运用经典话语建构全篇内容的《学官颂》,或许是曹植作品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之一。其实,曹植辞赋作品运用经典话语表达内容情感的情形也相当普遍。总体而言,曹植辞赋运用经典话语的表达方式,大致有如下三种的类型。

第一,直接引出经典篇名,取用其篇章基本义或部分含义。

如《临观赋》“叹《东山》之愬勤,歌《式微》以诉归”两句,就是直接引用《诗经·国风》“《东山》”和“《式微》”二诗的篇题名。《豳风·东山》写久别家园的征夫归乡途中的经历和设想还家以后的情景,故《诗序》以为“《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序其情而闵其劳”^①。《邶风·式微》全篇只有两章,其中有诗句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②当是写苦于劳役之人不能按时归家的幽怨之情。《诗序》则以为是写“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建安曹魏之时,在诗中引用《东山》《式微》诗名的,还有王粲《从军诗》的“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日月不安处,人谁获恒宁”^③,以及曹植《情诗》的“游者叹《黍离》、行者歌《式微》”等,均借《东山》《式微》表达“思归”愿望。因此,联系到《临观赋》的写作背景、文本内容及这两句诗的上下文,再比照曹植于魏明帝太和五年仍不得归京且不得与“诸国通问”而复上《求通亲亲表》等,其所谓“叹《东山》之愬勤、歌《式微》以诉归”的赋句,当是曹植借二《诗》“惓惓不归”“式微不归”的基本诗意,表达自己欲进无路、欲罢不能、“欲归”不允的凄惨处

境和幽怨情思。

又《幽思赋》有“搦素箏而慷慨,扬《大雅》之哀吟”,直接引用《诗经·大雅》之名。《诗经》有《大雅》《小雅》之分,但郑玄《诗谱序》认为西周后期幽、厉而下“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怨刺相寻”^④,故谓之“变风、变雅”。《毛诗正义》更以为《大雅》中自《民劳》《板》《荡》以至《桑柔》等五篇,即所谓“厉王变大雅”。这些“大雅”诗如《桑柔》有“于乎有哀,国步斯频”“哀恫中国,具赘卒荒”之句。曹植既名其赋曰“《幽思》”,其“扬《大雅》之哀吟”应是取“大雅”诗中有所谓“变雅”哀怨诗的部分含义,以借写心中的幽怨不平之气。

《酒赋》“辟《酒诰》之明戒”一句,直接引用《尚书·酒诰》的篇名,是取用《酒诰》篇叙周公以商纣因酗酒而身死国灭之事,以命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法令的基本文义。

《神龟赋》“嗟神龟之奇物,体《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则地,上规隆而法天”,“嗟禄运之《屯》《蹇》,终获遇于江滨”,直接引用《易经》之《乾》《坤》《屯》《蹇》两组四卦卦名,而分别直接取其字面所含效法天地和命运艰危之意。《玄畅赋》“饶余生之幸禄,遭《九二》之嘉祥”,则是用《易经·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⑤的基本义,表达了作者希望有幸为朝廷所用的期盼。《鹞赋》“体贞刚之烈性,亮《乾》德之所辅”,取《易经》之《乾卦》象征刚健之德的基本含义:《周易·说卦》曰“乾,健也”^⑥;又《周易·杂卦》曰“《乾》刚《坤》柔”^⑦。所谓“乾德”,即指刚健之德,曹植此赋用以赞美鹞鸟的“贞刚之烈性”。

第二,截取经典文句或词语的字面意义入赋,从而使赋篇内容自然呈现出庄重典雅的经典意味。这种情形较多见于曹植辞赋对于《诗经》及《左传》《三礼》等经典的运用。

先看引《诗经》之例。《归思赋》“信乐土之足慕,忽并日之载驰”。“乐土”一词,引自《魏风·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③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王粲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0页。

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①之句中,此诗原意是揭露统治者贪婪“重敛、蚕食于民”,人民被迫走出他乡、远寻他们心目中的“乐土”;“载驰”引自《邶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②句,原诗形容许穆夫人闻其兄卫戴公丧亡噩耗后驰驱归国吊唁。《归思赋》征引《诗经》成句且两语并用,充分地表达了赋作者离开荒芜莫振的家乡雒县,满怀期盼地奔向“乐土”邺城的急切心情。

又《大暑赋》“寒泉涌流,玄木奋荣”,其中“寒泉”引自《邶风·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③句中,《郑笺》谓“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润之,使浚之民逸乐,以兴七子不能如也”^④,《诗序》云“美七子能尽其孝道”。曹植此赋之“寒泉涌流”则不牵涉孝道之义,直接使用其“清凉”的字面本义,说泉水可以给人带来清凉的感觉。又《藉田赋》“好甘者植乎芥,好苦者植乎荼”,是说喜欢甜的人种植芥菜,欢喜苦的人种植茶菜,因为芥甘而荼苦。而“芥甘”“荼苦”之词,出自《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⑤,诗人用以比喻妇人为夫所弃,比起被抛弃的痛苦来,茶菜的苦味就像芥菜一样甘甜。《谷风》中的“芥甘”“荼苦”均指人生的幸福与痛苦,而曹植《藉田赋》使用其本义,即味道的甘苦。

再看引《左传》之例。如《闲居赋》曰“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介特”引自《左传》昭公十四年:“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⑥《左传》中“介特”的本义为孤独之意,曹植此赋即取“介特”抒发自己孤独无友的悲伤。

再看引《三礼》之例。曹植辞赋常引《三礼》之名物及典章制度,大多不需特别引申。如《东征赋》“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所谓“六师”即“六军”,见于《周礼·夏官·司马》“王

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⑦之文。《东征赋》“六师”一词,为借用《周礼》“王六军”正大壮盛之意。又《鹞赋》“成武官之首饰,增庭燎之光辉”,“庭燎”即照明庭中的火炬,引自《周礼·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⑧。《鹞赋》用“庭燎”一词状写武士所戴鹞冠在火炬的照耀下光彩夺目。《叙愁赋》曰“承师保之明训,诵六列之篇章”,其中“师保”引自《礼记·文王世子》“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⑨“师保”指教育帝王子女的官员,《叙愁赋》引“师保”之语取其师保教育之义。又《离缴雁赋》“含中和之纯气兮,赴四节而征行”。“中和”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⑩。《离缴雁赋》引“中和”之语以言雁之纯淑祥和的品性又兼以自喻。

第三,化用经典词语以取其引申意义,并不限于字面之义而有所延伸。

这种运用经典的话语表达方式在曹植辞赋中较为常见,赋作者不限于引用经典话语的字面之义,而更着重于所蕴含的言外之意。

如引用《诗经》之例。《节游赋》“诵风人之所叹,遂驾言而出游。步北园而驰骛,庶翱翔以解忧”。“风人”即《诗》人,“驾言出游”语出《诗经·邶风·泉水》末句“驾言出游,以写我忧”^⑪,意为驾着马车出游以排遣思归不得的忧愁。《节游赋》在《泉水》两句诗意的基础之上增加文字而扩展为四个六言句以适合辞赋的句式特点,并引申为借出游之乐消解人生无常的生命忧伤。

又如《蝉赋》“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与于园圃……持柔竿之冉冉兮,运微黏而我缠”。“狡童”并见于《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充,乃见狡童”^⑫,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30页。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6页。

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30页。

⑧(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5页。

⑨(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3页。

⑩(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⑪(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①《郑风》两诗中的“狡童”,是戏谑地指称情歌中的男士为狡猾的小儿、男子。《蝉赋》中的“狡童”,则是指捕蝉的顽童,他们是扼杀蝉之生命的暴徒。又《蝉赋》乱曰“《诗》叹鸣蜩,声啁啁兮”,通过增字改写的方式,化用《诗经·小雅·小弁》“鸣蜩啁啁”之句,描写蝉的善鸣及音声动听。

《离缴雁赋》有“蒙生全之顾复,何恩施之隆博”之语。“顾复”一语乃化用《诗经·小雅·蓼莪》之语“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②。曹植赋引“顾复”一语,将《蓼莪》原诗父母“照料、庇护”子女之义延伸为对于拯救“离缴雁”生命之人的感恩。

如引《仪礼》之例。如《鹦鹉赋》曰“遇旅人之严网,残六翮之无遗”,其中“旅人”引自《仪礼·

公食大夫礼》“旅人南面加匕于鼎”^③，“旅人”指周代宫中掌烹割之官。《鹦鹉赋》引“旅人”而增“严网”一词,构成两个六言对句,引申为捕鹦鹉者布下巨大罗网,摧残众多弱小生命,且暗喻曹丕对其兄弟诸王的无情忌害。

再如引《论语》之例。《喜霁赋》“指北极以为期,吾将倍道而兼行”,《尔雅·释天》言“北极谓之北辰。”而“北辰”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④。《喜霁赋》通过改写化用,引申为自己愿意追随新君曹丕为建立“德政”目标而努力奋进。又《迷迭香赋》“信繁华之速实兮,弗见凋于严霜”,是化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⑤句意,以赞美迷迭香具有不畏严寒的坚贞品质。

Cao Zhi's Consciousness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i-Fu* Literary Creation

ZHANG Jia-guo^{1,2} & HE Xin-wen¹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riter's acceptanc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s often internalized as the consciousness or unconsciousness, and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Cao Zhi was a representative *Ci-Fu* writer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consciousness in the Wei-Jin period. He learne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his childhood. He not only committed to the Confucianism, but also formed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Confucian consciousness in his view of life presented the pursuit of Confucian political ideals and the acceptance of Confucian moral and ethical concepts. In his writing of *Ci-Fu*, classic consciousness showed an active and realistic spirits in the content and theme. The form of the language showed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words, it either quote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rticles directly in order to use the whole meanings, or intercepted the Classics' sentences and words in order to use its surface meanings, or paraphrased the Classics' words in order to use its implied meanings.

Key words: Cao Zhi; *Ci-Fu*; the consciousnes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Confucian ideal; the realistic spirits of serving the nation

(责任校对 蒋云霞)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0页。

④(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页。

⑤(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5页。